

臺大歷史系講論會

十三世紀的聖人主教——以坎特伯里大主教艾德蒙·亞冰登 (Edmund of Abingd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233-40) 為例

劉慧老師主講

神學家艾德蒙·亞冰登生於 1175 年左右，從 1214 年開始在牛津教授神學，直到 1222 年成為沙斯伯里主教座堂的財庫長 (Treasurer of Salisbury) 為止，1233 年當選為坎特伯里大主教，成為英格蘭教會領袖。擔任大主教期間，協助調解 1234 年初國內的政治對立和短暫內戰，幾度安排威爾斯與英格蘭間的休戰，試圖提高教會法庭的審判權，也在 1236 年為英國國王亨利三世主持婚禮。1240 年 11 月 16 日死於法國境內的斯瓦希 (Soisy)，幾日後下葬在不遠處的龐提尼 (Pontigny) 修道院的教堂中。他去世不久，龐提尼修院和艾德蒙之前的下屬與友人積極展開活動，希望他能被教宗正式認定宣布為聖人；教宗在 1244-1245 年間，兩度派人在英、法分別蒐證調查，最後在 1246 年 12 月中宣布艾德蒙為聖 (enrolled in the catalogue of saints，或稱列入聖品、列入聖人級)。

從龐提尼修院院長的信中，可看到多數的神蹟都與醫療治病相關，也看到艾德蒙生前有不少敵人。教宗認定他為聖人的詔書則展現教宗對聖人的態度：有母親對優秀子女

的自豪、有敬佩、但絕非一味崇敬，也可見到聖人的幾個特色：死後能造成醫病救難，生前既擁有眾多美德、又有棄世的生活方式。《聖艾德蒙傳》中又加上了聖人在世時經歷的異象。

然而，曾與聖人親身接觸的人看到的是他另一種面貌。棄世式的壓抑身體的行為並不適合為外人道，否則有沽名釣譽之嫌，美德的判定又與環境相關，謙遜退讓和行事不合身分，可能只是一線之隔。官方檔案中展現的聖艾德蒙，在外交和高層政治活動上，是立場超然、愛好和平的調解者；在教會與俗界爭取司法審判權時，卻是消極而缺乏計畫的；在與最親近的「同事」、坎特伯里隱修士的互動上，欠缺魄力和成效；在死後卻被英格蘭人視為是對抗國王專擅的代表與不願妥協的勇者。



▲劉慧老師 (2012 年 4 月 12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講論會/演講摘要

路易十四時代佩劍貴族的書寫、出版與讀者回應——以拉侯謝傅科公爵的《格言錄》與友群觀批判為中心的幾個問題討論

秦曼儀老師主講

在筆者對於法國從 16、17 世紀至 18 世紀這段舊制度時期，第二等級成員與出版關係之變動脈絡的探詢工作中，本研究將以學界普遍接受的「貴族作家」(gentilman-writer) 此歷史圖像，做為問題討論的出發據點，透過拉侯謝傅科公爵 (François,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尤其是其留存豐富讀者回應紀錄的《格言錄》(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簡稱 *Maximes*) 為中心，嘗試說明和釐清：舊制度時期法國人士認知的「出版」(publication) 之意並非單指印刷出版；而在政治與社會變遷的世局中，17 世紀「佩劍貴族」(noblesse d'épée) 出身者的書寫與出版實踐，不僅體現其焦慮與調適，也成就了日後伏爾泰以「路易十四時代作家」稱之的智識與文學表現。

自 16 世紀末到 17 世紀，法國大貴族為辯護自身於神聖聯盟宗教戰爭期間 (la Sainte Ligue, 1585-1598) 或於投石黨叛亂期間與王室對立的政治行動，開啟了回憶錄 (mémoires) 的寫作之風，其中包括本文主人翁首部的印刷作品。在這些回憶錄裡，「公眾」明顯指稱王室和大家貴族的宮廷人士，而非構成公民社會的所有成員，更非底層老百姓。若以王室和大家貴族人士為「公眾」

所指範圍的上限，我們可以借助 17 世紀首次出現的期刊雜誌劃出下限範圍：即隨著官方報《新聞》(Gazette) 於 1631 年問世，其他諸如《歷史的謬思》(Muse historique)、《宮廷謬思》(Muse de la cour)，以及 1672 年出版的《文雅信使》(Mecure galant)，其報導的對象與明白訴諸的閱眾——上層社會及上流社交圈的人士。雖然那些對於手抄版《格言錄》發表過意見的公眾也會是印刷版的實際讀者，但拉侯謝傅科在修改前言的過程中，逐漸定調自己設想的並與之對話的讀者對象為那些有教養、但不屬上層社會或上流社交圈的人士。如果拉氏不能也不想以公爵身分印刷出版《格言錄》，他也無意選擇匿名的大爵爺 (seigneur) 這種顯示作者在社會地位上與生活經驗上遠遠區隔於一般讀者的稱號：在使用「我親愛的讀者」此親狎的對話形式後，公爵決定假託出版《格言錄》的巴黎書商之聲和其生活體驗，以凸顯格言之於讀者的親近性與普世性特質。



▲秦曼儀老師 (2012 年 5 月 3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 「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

王遠義老師主講

五四運動期間，胡適與李大釗進行的「問題與主義」論辯，就事後中國的政治與思想演變來看，可說是二十世紀國共鬥爭之成因、性質與過程的發端與徵兆。

歷來中外學界對此歷史性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論述不知凡幾，早是老生常談的論題。然而，本文認為，論辯的文本（texts）本身雖然觸及到二十世紀現代性的核心危機：自由與獨裁的問題，特別是中央計畫（central planning）的問題，但胡李兩人並未能悟識到論辯本身所具世紀性危機的意義，文本本身也無法完整反映這一危機的重大意義；西方世界也要到 1938 年或 1939 年才由海耶克初次系統地、整體地將此危機論證闡釋出來。由是，胡李兩人在論辯中真實的立場與見解要放在什麼位置上來觀察、評價，遂成為重要但困難的問題，也常為評論者、研究者不察不見。換言之，這場論辯是齣未落幕的劇，有待觀聆後續的接幕。因此，拙文循此途徑，試圖提出與過去中外學界對此重大問題不同的「新解」。

而由於胡適在 1954 年公開申明，他因受海耶克影響，今是昨非，放棄過去許多重大的思想見解，轉而支持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拙文不但分析、比較海耶克與胡適兩人相關思想，是否正如胡適「懺悔」、

「洗腦」之言，同時也借用海耶克的思想學說，檢討「問題與主義」論辯的真意，詳人所略。

此外，拙文也就林毓生先生所發問之問題，試以應答。林毓生先生曾指出，五四時期與後五四以來，中國的歷史條件並沒有太多的思想資源可以抗拒馬列毛式的革命運動，而 1919 年是個重要的轉折點。拙文試圖歷史性地分析各時期胡適對自由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看法與改變，並將胡適一生各時期相關的見解予以整體性地把握、綜觀。

本文試圖將「問題與主義」論辯放在二十世紀世界史現代性危機的脈絡中來透視、評論，此為本文新的嘗試，希望來還「問題與主義」論辯一個本來的面目。此外，拙文經由研析胡適一生有關自由與獨裁的思想主張，也試圖重釋重現胡適自由主義中最重要卻被誤解、忽視的問題所在。



▲王遠義老師（2012年6月14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生為中心的分析

楊典錕老師主講

中日甲午之戰的結果，顯示了日本後來居上，在學習西法改革以資救亡圖存的實際成效方面，的確優於在東亞文化圈內自漢、唐以降大多處於對日之「文化輸出者」地位的中國。因此甲午戰後的清國，鑑於鄰邦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改革已初見成效，除直接聘請日人前來協助進行各方面建設外，亦開始派遣留學生赴日留學。在近代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此一過去的文化輸入者（日本）對文化輸出者（中國）的回饋，可說是一股「文化回流」的現象，在中日交通以來的文化交流史上，實具有劃時代意義。

軍事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若能認識它的全貌，就得以把握中國近代史的關鍵。自甲午以來的中國既然開始以日為師，從殖產興業到富國強兵等無所不學，近代中國的軍事建設自然也受到了日本相當深遠的影響。筆者擬將問題意識聚焦於清末民初時遠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身上，俾利對彼等在中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及近代中日外交史、交流史上的存在意義做出分析。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在近代中國軍事史、政治史的研究上，或是近代中日交流史、外交史等關係史的研究上，可說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課題。因為培養近代中國之軍事人才的四大來源中，成立

最早的即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中國留學生制度。清末之各省的講武堂等各種軍事學校、民初成立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以及國共合作產物下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三者成立時所聘任的師資，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仰賴日本陸士之中國留學生的供應。

學成歸國的留日士官生漸次投入近代中國的軍事教育最前線，使得清末乃至民初曾大量僱聘之德國、日本等國的外籍軍事教官的需求量因而逐年降低，這對近代中國之軍事教育的永續經營，以及國家生存發展之獨立自主等方面均有頗大的貢獻，影響相當深遠。從參謀制度到軍政、軍令一元制的建立、秋季野戰演習的實施，及對各級軍事學校的經營等方面均是如此。此外，南方革命勢力、袁世凱、段祺瑞及張作霖等四股勢力對留日士官生們的拉攏、重用，除為這些勢力的當權者們帶來了一定的政治利益或軍事效益外，也反映了留日士官生各自的政治傾向。



▲楊典錕老師（2012年6月21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